

向开国领袖学工作方法

——读金冲及《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



□ 张海鹏

金冲及同志是我国党史领域研究资历深厚的学者。他长期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主编或参与主编了这六位开国领袖的传记，撰写了有关他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系列文章。去年，他把学习、研究这些开国领袖工作方法的文章汇集出版，题为《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0月）。本书篇幅不大，只有10余万字，但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讲，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读物。

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多年，是5000年来中华历史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尤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此基础上又把国家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所付出的流血牺牲，所经历的辛劳困苦，所跨越的世纪难关，客观地说，为世界历史所仅见。这真应了那句古话：时势造英

雄，英雄造时势。毛泽东等六位开国领袖是时势造出的英雄，又是造出时势的英雄。

本书由毛泽东工作方法的几个特点、周恩来的求真与反对极端主义、刘少奇是善于独立思考的战略家和理论家、朱德的历史贡献、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陈云和学哲学等11篇文章组成。作者在书中结合新中国建立并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事实，着重分析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作者总结了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具有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具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具有对前途趋向的预见性。毛泽东主张：“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他能够在机遇到来时，当机立断，正确决策，大刀阔斧地打开新局面，而不是被动地忙于应付枝枝节节

的局部性事物；在应付眼前的具体事物时，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动未雨绸缪，预作准备。这就是战略思维能力，或者说战略眼光、战略头脑。第二，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能胸怀全局，判断什么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及时抓住并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毛泽东批评说：“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一些人受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分散力量，处处应付，四平八稳，下不了大的决心，也就做不出大事来。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是毛泽东的重要工作方法。当然，抓主要矛盾，不是不管其他方面。对于负责一方面主要领导工作的人，他也提倡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第三，当情况已经弄清，决心已经下定，就要下决心抓工作。工作抓得紧不紧，抓得很不狠，就成为关键。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是毛泽东工作方法上的名言。第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要做好任何工作，都不能只靠领导者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智慧和努力，而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邓小平的重大贡献。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照本书作者的解释，第一，它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第二，它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要使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基本原则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使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邓小平还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步走”的战略设计。通过“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主要指生产、生活水平。邓小平说，“这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本书作者强调，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位、关于“三步走”的战略设计，“就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

展规定了一个积极而又扎实可靠的基本设想，从指导思想上防止了重犯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而急于求成的错误”。这就体现了一种长期起作用的战略思维。

作者在书中概括了开国领袖们都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都是战略家，其工作方法有共同特点，那就是：实事求是。周恩来总是强调，衡量一件事“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论面对革命、建设工作，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结合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保持冷静的头脑，反对“过与不及”。

刘少奇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我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既是一个战略家也是一个理论家。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善于通过现象抓住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说：“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可见他的真理观是客观、务实的。

朱德在军事领域的贡献为我们所熟悉，他曾经说过：“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用兵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他对经济管理方面的贡献有据可查，通过调研，认为统得过死，不利于发展，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对外贸易、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结合，这些建议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他的远见卓识同样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陈云提出，实事求是，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十分复杂的并且在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待马克思主义，决不能采取简单化庸俗化的态度。陈云说过：“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

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人们犯错误，往往是由于思想方法出问题，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上的认识有偏差。这些说法都是很精辟的。

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正在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复杂的现实与艰巨的任务，重温领悟开国领袖们的工作方法，对于我们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益处。

书海泛舟

用典释义

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

【讲话原文】

中共各级党委要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提供支持，认真听取和积极采纳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同志们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情况。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1月22日）

【出处】

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涣之用大臣交荐召对，因言：“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今国家每下求言之诏，而下之报上，乃或不然，以指陈阙失为讪上，以阿谀佞谄为尊君，以议论趋时为国是，以可否相济为邪说。志士仁人知言之无益也，不复有言，而小人肆为诡譎可骇之论，苟容偷合。愿陛下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事无今昔，唯当为贵；人无同异，唯正是用。则人心说，治道成，天意得矣。”

——（元）脱脱、阿鲁图等《宋史·列传第一百六·王涣之传》

【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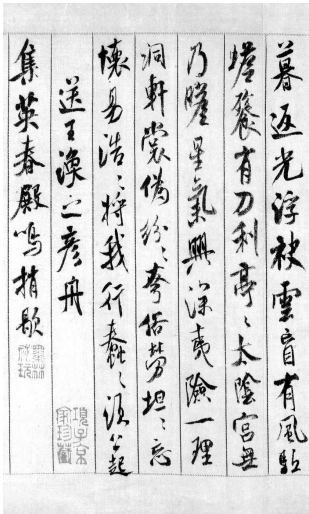
王涣之（1060—1124年），字彦舟，北宋元丰二年（1079）进士。据《宋史》记载，王涣之生性淡泊，恬于

仕进，常言：“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则无事矣。”

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出现日食，经大臣推荐王涣之应召入朝言政。他劝谏新君：“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希望徽宗“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意思是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无论所言逆耳还是顺耳，只要是正确意见都应当听从。徽宗“欣然延纳”，并想任命他为谏官、御史之职。王涣之以“臣由大臣荐，不可以居是官”为由，坚辞不受。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他指出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情况。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博大襟怀。

（杨立新）



（宋）米芾《送王涣之彦舟》

徐特立论怎样抓科研和学习

□ 叶介甫

徐特立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一生“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怎样抓好科研

1940年，党中央为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学院。学院成立后，党中央委任徐特立为院长。当时，对于如何进行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建设，在自然科学学院甚至在党内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而边区科学技术人才缺乏，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这个矛盾更加突出。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陆续建立了一批工厂，如石油厂、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造纸厂、炼铁厂以及兵工厂等，都迫切需要技术人员。就当时那么一点技术力量，怎样使用？是统筹安排，让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建设，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搞好科学教育工作、培养新生力量呢，还是只顾眼前生产建设的急需而不办、缓办科学教育，或者只顾办科学教育而不考虑当前生产建设的迫切需要呢？有人主张只搞生产建设，不必办正规学校。如果办学校也只能搞短期的技术教育，不必搞系统的教学。他们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院改为比较高级的职业学校。

然而徐特立坚持要把自然科学学院办下去，他认为，既要支援当前生产建设的需要，又要统筹兼顾，不能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需要。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像政治、经济、军事等工作一样，每一步骤，既要我们从当前的实际需要出发，又要照顾将来。“见近不见远”或“见远不见近”都不可取。他还主张加强基础科学知识教育，教给学生系统的科学知识。

徐特立多次语重心长地说，要善

于吸收前人的和外国的经验教训，眼光要看远一些。他在边区的《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曾进行设计教学，废止科学系统，结果儿童所了解的只是个别问题的经验，而科学降到最低的水平。在第一次五年经济建设前不久停止了设计教学而提出系统化的口号。”

在徐特立的精心培育下，顺利地开展了教学工作，同时还抽出了一部分力量参加了边区科学调查研究工作。虽然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同学们大多数未能在自然科学学院完成全部学习计划就离开了延安，但都已打下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基础，高年级学生还取得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全国解放后，不少人通过进一步的学习与实践，掌握了一门专业本领，成为新中国的一批科技工作骨干。

怎样搞好学习

在学习观上，徐特立始终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成规。

他认为，理论必须与实际密切结合。他说：“研究科学如果停止在书本上（即原则上），与停止在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上，同样是非实际的。”他还把读书、钻研学问生动地比作打仗，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攻坚”，第二是“掠野”。所谓“攻坚”，就是要像攻克敌人的据点一样，掌握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最新成果。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都是下苦功夫、长期刻苦钻研的结果。但是只“攻坚”还不够，还必须更广泛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大知识的广度，这就是“掠野”。学习就“像作战一样，其中对象是守住中心据点，一切掠野是为着攻坚，是为着守这一据点”。

从1942年开始，我们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运动，对王明一类白谓神圣、自命

不凡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指出他们“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有一句最主要的没有读，即《费尔巴哈论》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他们虽然满嘴马克思主义的口头禅，其实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徐特立认为判断一个同志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他嘴巴上能否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行动上是否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解决革命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他说：“离开职业事业专凭一己的议论论人们的政治水平，必然要把马列主义空洞化、庸俗化、书本化。”

徐特立曾告诫广大青年：“一切事业一切学说一切前人的遗产摆在你们面前，你们都不拒绝都欢迎，但那都不是神圣的，都要经过你们的脑来分析，经过你们的手来试验。检查的标准不是成规，而是你们革命的大多数人的行动……同时一切要经过自己的脑，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自觉的服从，一切不经过脑的信仰是迷信。对于一切真理都要经过自己的脑加以分析，加以集体的讨论，不以任何真理神圣化，还要经过自己的手及群众的手执行过，在革命过程中，还要加以补充，加以发展。”

1958年，党领导开展了一个勤工俭学和教育革命运动。徐特立根据我们党的革命经验，针对当时的错误倾向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然并不是否定读书和书本知识

的意义。书是一定要读的，正确的书本知识也是极为重要的。不读书，我们如何继承和借鉴旁人积累起来的许多斗争经验呢？”

在当时片面强调实践、强调生产劳动，忽视书本知识、忽视课堂教学的情况下，徐特立这些意见显得难能可贵。

治学方法

在今年的“中国好书”年度颁奖典礼上，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所著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华书局出版社2016年7月）荣获30本好书之一的殊荣，可谓实至名归。

《资治通鉴》与《论语》《左传》《诗经》《史记》一样，都是后世的人们一直在重读或重新认识的古代经典文献，并曾衍化为一门专门之学或者引领一时的学术风尚。其原因有统治者的倡导，有学者们的褒扬，也有时代风潮的推动。

《资治通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产生于中国古代处于转型期的宋朝，其原来的书名为《通志》，差一点因此而湮灭了唐代郑樵的另一部同名巨著，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御赐为今天广为流传的书名。南宋朱熹首先推重此书，并删繁就简而成《资治通鉴纲目》。朱元璋、康熙、乾隆都有“御批”传世。顾炎武认为该书“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此书的价值在于“知历代兴衰，明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因而成就另一部宏篇大著《读通鉴论》；曾国藩独具慧眼，认为其“穷物之理，执圣之权”“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曾氏对《资治通鉴》功用之譬喻一时影响了毛泽东；梁启超称赞《资治通鉴·魏纪五》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教科书。据说毛泽东同志爱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写有大量的批语，其中对后者更是读过十七遍。习近平同志多次在讲话中引述《资治通鉴·魏纪五》中语，如“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并赞同司马光关于君子与小人之辨，引用其“天下之事未尝不败于专而成于共”的名言，倡导协力合作的从政思维。列举这些古今名人智者和领袖们对《资治通鉴》的独赏与褒扬，正表明《资治通鉴》这部伟大作品创作的初衷，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专取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才使其能够成为后人反复阅读、不断地被重新认识的史学经典。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凡1362年，全书300万字。司马光带着其团队

成员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同时参考了三百多部著作，用十九年的时间完成这部大书。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周恩来批示当代史学家顾颉刚、聂崇岐等校点，加上胡三省注及附录，由中华书局于1956年开始出版，成为至今一直广为流行的读本，与1959年宋云彬先生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都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钟爱读物。复旦大学姜鹏教授比喻《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作为政治家笔下的类似教科书的历史书籍，如何读，怎样读，史学家张国刚教授积四十余年治史的功力，以“家国兴衰”为主线，为我们展示了历史的一种新读法，颇具新意和新气象。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是为清华大学开设“《资治通鉴》导读”的课程，2014年又成为开设“慕课（MOOC）”课程的新成果，而后成为一部独具心裁的专著，作者的初衷就是想用通俗的方法来展现历史带给我们当代人的思想智慧。书中旁注的文字更多体现了张教授的精彩史评，经过知名出版社编辑的编排而展示了独特的匠心，更加精炼可读，可谓点睛之笔，尤应成为广大党政干部读史鉴今的阅读精品。

张国刚先生在熟读《资治通鉴》的基础上，为读者重点讲述了治国安邦、执政为民的道理，书中的格言警语随处可见，读来多多受益。针对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的历史细节，该书抒发着史学家的情怀与机智，比如作者认为：

领导素质有仁、明、武三个标准；用人要以德为先，德胜于才；一个成功的优秀人才必须谦卑、低调；既要目标坚定，又要步履稳妥，这是成事者应有的风度；秦国所以能统一天下，在于它的几代统治者的战略思路对头，领导人本身的素质过硬很重要，而一个国家的兴衰是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的；李斯那种自我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得失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王莽擅权走向末路，问题在于没有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缺乏操作能力；学会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对于胸怀大志的领导很重要；在评价曹丕曹叡时代时说，领导人个人的才能智慧，在国家

的安全与治理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提炼与警示性语言，激发读者去进一步思考其背后的历史内涵与哲学意味。

时代的潮流决定了家国的兴衰，这是大的历史格局所决定了的。从某种偶然性来说，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刘邦的判断力与决断力是超群的，而用人是他成功的关键；项羽作为领导者，其气度胸襟与处事则成了历史上总被人扼腕叹息的教材。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借鉴诸多历史名人的阐发，微发覆，缜密思索，着力生发出符合时代特点的历史智慧。这既展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当代价值，也证明着当代史家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为社会大众服务、为当代生活点赞的使命担当。

书而思

今天我们如何读历史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读记

□ 李岩